

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^①

毋忘笔记

这个讲演，前面四篇是毋忘先生记的，第五篇起是我记的。此次修改原稿的时候，毋忘先生病在医院，所以这修改的责任，应该全归我负了。

伏 庐

—

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校长、教育部、尚志学会和新学会，使我今天得来此讲演，实是我国际的荣誉。

我这第十六次讲演的题目是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》，便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。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。正如人先会吃饭，然后有生理学、卫生学；先会说话，然后有修辞学、文法学、名学。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。人类先有制度、风俗、习惯，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。

这是杜威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的讲演词，自 1919 年 9 月 20 日起 共讲 16 次，由胡适口译，毋忘笔记。

人类有一种天性，遇需要时，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。例如饿了要吃，倦了要睡，久而久之，便成习惯了；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：吾们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样了便如何？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，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。有许多志士往往对于制度、风俗、习惯发生疑问，以致牺牲了性命。历史上的证据很多，希腊的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便是个最显明的证据。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，人家便加他个妖言惑众、引诱青年的罪名，把他毒死。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。

这样说来，凡是思想和学说，都是讨人厌的东西，便应大家从了制度、风俗、习惯走，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呢？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，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。譬如走路，遇了困难，才发生造舟车的思想。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，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，亦复如此，总要一切制度、风俗、习惯，到了这个时代，或者不适，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发生。所以社会哲学的发生，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；政治哲学的发生，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。

从历史上看去，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，一定不会发生医学、生理学、解剖学的。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染了病，所以才有医学、生理学、解剖学。社会政治亦然，必是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，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。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的发生，正在他纷乱征战的时候。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，决不会有柏拉图（Plato）、亚里士多德（Aristoteles）等的学说发生。我的意见如果不错，那么中国各种学说发生，亦当如此。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，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，也决不会有老子孔子两大派的学说发生的。

以上所讲的，不过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以后的原因，现在要讲发生以后的影响。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因社

会和政治有病，然后发生的，那么还是种空言病状的诊书呢？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？譬如汽车的汽，是呜呜然放出的呢？还是真能发动各种机械的呢？这一点是应当注重的，也是现在所应当讨论的。

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，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有两派极端的学说：（一）极端的理想派。这派以为学理对于实际有极大的影响，没有学理，便什么也没有。他们的缺点是忽略人类的习惯、自然的倾向和种种没有智识的行动。这是太理想的了。例如这次欧战，依这一派人说，以为都是两种学说冲突的结果。（二）极端的唯物派。这派以为无论什么理想，都是物质的果，不是物质的因，学说不过是一种的果。这一派的人无论批评什么，都应用唯物历史观的。他们注重生活状态、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利益，甚至某种美术也说是某种生活所发生的。

这回大战，依唯物历史观的一派看去，完全不是思想的冲突，是物质上的冲突。德国在战前，物质发达已极，不得不向外发展，所以要争海上、商业、殖民地等霸权。就是英国方面，也有许多物质上的动机。这固是不错。但依这一派说来，简直完全是物质的，一切哲学、宗教都是物质所生的结果；甚至于正义、人道、文化等好听的名词，据他们说来，都是资本家和军阀造出来哄人，做保护自己物质的器具，这也太过了。我提出这两派相反的学说来，并不是想批评他，不过略为研究，好引起第三派的学说来。第三派的学说是最公平的。大概思想学说最初发生的时候，都是果而非因，但发生以后，他又变做因了。思想学说很像漏斗一般，漏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，便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。思想学说一经传布到人，人有摹仿、

崇拜的心理。在这人是果，传到那人又变因了。吾们对于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政治上要他发生什么影响？所发生的影响怎样是好？怎样是坏？这是吾们要讨论的。

思想发生以后，第一种功用是把流动的变为凝固的，暂时的变为永久的。如有一件变迁不定、一瞥即过的事实，把他抽象的提出来，变了一种学说，便凝固了，永久了。这个关系，实在太太，往往引出危险。如罗马旧教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采为正宗哲学，便是一个例。又如东方孔子的学说，一经许多儒家的祖述，便二千年相续到今，也可以想见这种功用的利害了。

第二种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候，可以维持许多人的信仰，去做很重大的事。例如这次欧战，只把自由、正义、公理战胜强权几个名词，可以使多数人去战争。这可证明唯物历史观一派的错误。若说这是资本家、军阀所利用的，那么吾要问他们为什么单要造这些空名词，这些空名词又怎样能号召人去打仗呢？于此可见学说的势力，也可见人类的动作，不单是物质的动机。

以上所讲的两两种功用，不单是好的学理有，便是坏的学理也有，不过好坏的效果不同罢了。吾们现在先讨论从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，然后再讨论现在是否有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需要。

大抵这种派别，与人类性格的分类很相近的，不外急进和保守两派。急进派不满于现在的社会、政治，往往想把他根本推翻，另造一个乌托邦。

这一派对于现代社会政治，简直不睬，另有超于现在的社会政治。从历史上看去，这一派往往在先，保守一派往往在后。例如希腊，先有柏拉图，后有亚里士多德。柏拉图先不承

认当代的制度，自己想出个“共和国”来做他的乌托邦；然后有亚里士多德的保守论。又如中国，先有老子的哲学，后有孔子的哲学。老子不满足于当代制度，要去破坏他，另造个乌托邦，他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，想诸位早已知道了的。

第一派的学说不承认现代制度，要求他理想的制度，所以注重个人——个人的自由，个人的良知，个人的本体。第二派也不是满意于现代制度，不过以为现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，他本身也自有他的道理，后人没有照着他做，所以坏了，吾们只要去找出他原来的道理来改正或改良现制度便好了，所以趋于保守。

两派的区别：大概第一派主张抛弃现制度，另创乌托邦，第二派主张求现制度本身的道理；第一派注重个人的反省，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。自从有了这两大派的学说，社会和政治事实，都受了影响，有许多人才，都是因此发生的，吾们所以不可不注意。

历史上固然有许多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，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两大派。我形容这两派学说，不免说得过火一点。吾的目的，是要说出社会、政治的背景。因为人类有一种通病，不是过，便是不及，前几千年的人类都吃了这两种无端的亏。人类的生活，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，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。人类的责任，是在某种时间、某种环境，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，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。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。

上述两派，同犯一病，便是要“根本解决”。一派极端的什么都不要，可惜天上不会掉下个乌托邦来，所以他们流于无为。一派极端以为什么都有理，只要还到本身的道理去，可惜办不到。这两派虽各走极端，所犯的病却一样。

怎么可以使人类的智慧指挥监督他的动作，应付一时间、一环境的问题，便是现在要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。

二

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有种共同的趋势，便是创造社会的科学，关于人生的科学——把从前的自然科学，如物理、化学等的方法，渐渐应用到人生方面来。可见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、政治方面。今天所要讲的，便是这科学精神对于第三派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影响。

近世科学最初的起点，是和人生关系很少很远。所以第一步是天文学，进而为无生机的物理学、化学，再进而为有生机的植物学、动物学等。到现在，知道人生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，结果发生了许多人生科学，如人类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，以及宗教、历史、言语等学。这都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日用社会方面去。

这种种科学的发生，无论他的成败如何，但有一句话可说，便是人类的思想变迁了。从前以为只有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，关于人生方面何等繁复，何等不规则，决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。但是近来却知道人生虽是繁复，虽是不规则，也可分析到简单，并找出他的规则来，便也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。这点可以证明人类的思想是变迁了。

社会科学家发明了许多社会科学，但又看不起社会哲学。他们以为哲学是玄谈，是没有根据，不像科学有一定的律令，所以不值得去研究。

我并不想去批评他们，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可以说的：他们把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情形做了通则，以为百世而

上、百世而下，东海、西海，都可应用的。例如科学的经济学发生很近，时代是十九世纪，地域是西欧。他们把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，找出条理来，做了经济学的原则，以为上下古今，都可适用。这是社会科学所常有的错误。

就经济学发生的事实来看：（一）当时的经济组织是大资本制度，出产很多，销场很广；（二）经济发展的方法是竞争的，不是互助的；（三）经济组织的目的纯在赚钱，不在社会公共利益。经济学上的各种通则，都是根据这种事实发生的，本是从一种特别情形特别事实底下的通则，如供求定律之类。他们却要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去应用，变了公共的通则，又不许人家去修正。所以卡莱尔（Carlyle）、普希金（Pushkin）一辈人，要根本推翻这种绝对的定律，以为只可应用于一时一地，绝没有这种普遍性的，后来又另创了一种历史的经济学。

刚才所讲的一节，用历史的眼光来批评他。凡是一时代所发生的通则，时代变了，通则当然也变了，所以没有一种通则可以称为定律。历史是继续不息的，通则也是继续不息的，所以无论那一天决不能得一最后的通则。

我所以提到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，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可以分两方面说：（一）消极的方面。社会在那里长进，历史也在那里进行，所以要哲学去帮助他解说，不能单用描写或记载的态度，多少总有些理想。这是第一层。（二）积极的方面。社会科学发生之后，使人类思想变迁，知道人生的活动也可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他。然后社会哲学从空中楼阁里降下地来，使他带些科学的精神。这些精神是：（1）注重事实；（2）不尚武断；（3）不敢以为最后的；（4）不是天经地义，不过拿来应用的假设。因此成了带社会科学色彩的社会哲学。

第二层意思，是说社会科学介绍了科学的精神与社会哲

学，而成吾现在所讲的第三派社会哲学。这种哲学有三个特点：（一）实验的。从前的学说，都不根据人生日用的事实。现在这派学说，是人生日用处处可应用的，应用的结果，便可证明或反证这学说的好坏，吾们便可把智识和学理来指挥向导我们的行为。（二）特别的。从前的学说，不是笼统，便是普遍。现在这派的学说，是不用全称，不是笼统，都是特别的，没有普遍的。（三）他的目的，在养成智识观念，可以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情形，解决特种问题。

这种新的社会哲学，把智识学说看做指挥人生的一种工具。科学本分两种，一种是纯粹科学，一种是应用科学，现在可以应用科学比这种新的社会哲学。纯粹科学不把人生欲望与意志放在里面，这种社会哲学把纯粹科学的道理应用到人生欲望、意志上去，不但不排斥欲望与意志，还把学理去帮助欲望与意志，使他不陷于痛苦，不往邪路上去。

纯粹科学完全是旁观态度。譬如天文学，月亮的圆缺，都不与吾们相干，我们的欲望与意志，一些也不能加入。应用科学不然。譬如医学，把医生自己也作研究的一部。吾们研究社会哲学，要用应用科学的态度，以学理帮助指导人的行为去达他的目的。这是工具主义的态度，便是实验的态度。

社会哲学不是纯粹科学，乃是应用科学。如经济学的目的，是帮助人类经济的活动，向那一方面走，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生活。政治学也是如此。政治要怎样组织，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人生幸福。社会学是一种技术，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指导他们：那是对，那是不对。这便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。

再把医学来作个例。有一种是画符念咒、说病卖药的游方医生所用的医学；有一种是根据科学的医学。科学的医学

把智识来指挥、帮助他的技术，可以使人生得到利益。社会科学亦然。从前没有学理来指挥、向导人类的种种行动，便万事听皇帝，听长官，以为有好皇帝、好长官，便有好政治。这都是听天由命去碰机会的。推而至于各种人类的科学，都是如此。不要靠天，靠旁人，靠机会，而要用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一切，向导一切。

简单说，社会哲学何以要把他当作科学来研究，第一点，是现在人类进化到这样地步，交通便利，调查容易。现在要去调查各种社会、政治的情形，都是人类可以做到的。倘再不利用现在的文明，把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人类社会、政治的行为，可以发生很大的危险。偶然的一件事，便把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东西都废坏了。

第二点，关于方法，从前是笼统的、抽象的、理想的，现在是个体的、特别的、事实的。须要注重个体特别事实与通则通例的关系。如社会哲学要研究各地各种的时势，使与通则通例发生关系。

譬如铁路工程，决不能造一条笼统的、理想的、抽象的铁路，一个个都是具体的特别问题，如河流、山道、道路的高低，以及工程的经济，都要算计算计的。

欧洲思想史上有个例，十七世纪是个纷乱时期，有宗教战争，有政治战争，有朝代战争，因此当时便有一种国家主权、法律和秩序的需要。所以当时的学说，没有不注重国家主权、法律和秩序的。这是一种时期一种地方的一种特别情形，以后却变成了无论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都应当如此。至今还崇拜那国家主权、秩序、法律，吾们还看见这等学说在中欧的危险，结果发生这次的欧战。

到十八世纪下半期、十九世纪上半期，恰好有一种相反的

状态。自从蒸汽机发明以后，生计状态大变，从前干涉的学说不适用了。而且发生一种极端相反的放任主义、个人自由主义，可是这种主义到现在又不适用了。这种主义的流弊是被资本家利用。没有势力的人与有势力的人战，当然是没有势力的人失败的。所以哲学离开了时代和环境去讲很是危险的。

旧式的社会哲学，只是两极端：一是对于社会下总攻击，一是对于社会下总辩护。现在我们所讲的第三派哲学，不是总攻击，也不是总辩护，是要进步，可不是那天演的进步，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，是零买的，不是批发的。

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，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，改造社会。但是要再造改造的，都是零的，不是整的，如学校、实业、家庭、经济、思想、政治 都是一件件的 不是整块的 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。

以上所讲各方面零零散散的改革，都是很复杂的，几乎无从下手。须要一件件的把他分析开来，然后一件件的做去。今天到此听讲的人，学生居多。学生啊！你们以各人的智识，一点一点地去改革，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。

三

前两次讲演社会、政治的哲学不是凭空发生的，是在社会、政治纷乱不定的时候——病的时候，然后有医社会病、政治病的学说。这学说有三种区别：（一）悬一个理想的目的，与现状根本不同，去根本改造现社会和现政治；（二）这一派不如第一派的激烈，想找出个根本大道来，去补救、修正现制度不良的地方，结果是毗于保守的；（三）这一派与上两派都不同，

是想随时随地去找出现制度具体的病来，谋具体的补救或修正。

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第三派的学说，也把那（一）（二）两派的学说提出来略为批评。某种学说发起于某种病的时候，这学说的目的，在修正或补救这种病—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修正补救现社会、政治——吾们对于现制度要去解决具体的问题之外，还须有一点能指导全体的观念。譬如航海，有了罗盘，一定还要有地图。所以吾们要知道社会动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的冲突。有了这样的地图，吾们才可想出什么修正和补救的方法。从前旧派的学说，总好说两两相对的名词，如说个人与社会的冲突，人民与国家的冲突，法律与自由的冲突等，连冲突的具体原因都看不出来，还说什么修正、补救的方法呢？吾们现在所要找的，还是那具体的事实的原因，不是几个抽象对立的名词。

现在我们要提出第一个观念来。凡是一种冲突，不是社会与个人、国家与制度，实在是人群（Group）与人群的冲突。什么是人群？人群是人类有公共的目的去共同活动，小而至于一个游戏的组合——像球队——大而至于国家、种族，虽则大小不一，但是人群与人群既有许多接触，便不能不有冲突。所以凡是冲突的发生，都是人群与人群的冲突。

有一种需要和兴趣，自然会有一种人群发生。譬如男女之欲，是一种天性的情欲，有了这种需要，然后有男女居室，成一家族。又如饮食和自卫保身之欲，也是一种天性的欲望，有了这种天性的欲望，然后有商工业、交通业。人类又有权力的天性，所以有纷争；有纷争然后有政府，有法律，所以有国家。人类又有信仰的天性，所以有宗教。这都是人群所以发生的原因。总而言之，人类有天性、情欲、兴趣、需要，每一种天性

情欲、兴趣、需要，便可发生一个人群。

以上不过是讲人群发生的原因。现在要提出第二个观念来，便是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原因。譬如吾在家庭为一分子，在宗教、国家等等，也都是一分子，本来分不甚清楚。可是这许多人群，不能同时平等的发展，这便是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原因。从历史上看去，往往人群的发展偏向着一方面，其他的方面不是赶不上，便是被压下了，久而久之，积了几百年，那赶不上或是被压下的一方面，便要对于发展的一方面发生冲突了。吾请举以下的几个例。

第一，宗教。欧洲中古时代，从西历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，足足的一千年。这一千年里头，宗教组合最占重要的位置，其他如家庭的组合，政治的组合，多统属在宗教组合之下。他提倡独身，便将家庭的组合压下了；他提倡精神（克欲），便将因饮食保身等而发生的工商业、交通业等经济的组合压下了；推而至于算术，他反对的是耳目之娱，结果只有宗教的算术——便是用算术做宗教的奴隶；再推而至于教育，也只有教会的教育，他怕科学发达，去破坏宗教的根本观念，所以把别种教育组合压下了。从这个时代以后，宗教与各方面——政治等等——常常发生冲突，打了几百年仗，到现在如意、法等国还常有宗教和政治等问题发生，可见这个问题还没有完了。

吾举这个例，是说明宗教的组合在历史上占了奉为一尊的地位，把别的组合——政治、家庭、美术、教育等——都压下去，做他的附属品。这是很重要〔的〕，因为历史上除了三个例外，没有一处不奉宗教为一尊的。那三个例外是：（一）希腊；（二）中国；（三）美国。实际美国还算不得例外，因为美国的历史很短，他的老祖宗已经过了这奉宗教为一尊来的，美国人不过是前人播种、后人收获罢了。除了这三个例外，没有不经过

宗教独尊，把别的组合压下去，做他的附属品过程的。这不是很重要的例吗？

第二，政治。学者所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，有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争，而是家庭与宗教的争。譬如宗教主张独身，便成了独身的社会。但人有情欲的天性，要有男女居室，宗教的社会不容许他。看似个人与社会之争，实是家庭与宗教之争。所以不能把争的方面当作争的原因。除此以外，政治的组合在历史上也曾占过特殊地位，也曾把别的组合，如宗教、家庭等，压下去做他的附属品。现在有一段故事可以拿来证明这件事。有一个西洋人与印度人论东方所以不振的原因，西洋人说：“东方人不能维新，如印度土人，都最守旧。别的不说，印度人负重，向来用头去顶的。有一天运煤，煤虽载在车上，车还顶在头上。”印度人反驳他的话，很可证明政治组合的特殊地位。印度人说：“东方人因为习惯所囿，所以印度土人用头去顶车。然而西洋人用小车子载煤，小车子仿佛是政府，头顶是表明个人，小车子只算是表明政府。西洋人应受东方人的教训，便是政府的地位太重了。”西洋人把政府实在看得太重，别的不说，单说欧战以来，政府占了极重要的地位，什么路咧、矿咧，以及经济、财产、教育，都可给他掌握。结果吾们知道有许多的明白人发生疑问，究竟国家政府应否有这么大的权力，把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种种的组合，将来这种种怀疑，一定是有加无已。

第三，经济。方才所举第一个宗教的例，第二个政治的例，都是把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的组合，这等状态是否合理，早已发生疑问。现在举第三个例。常人都说美国物质文明发达，是毗于唯物观念、金钱主义的。这话虽不尽然，实际美国的经济组合确占特殊地位，把政治组合都压倒。大资本家

压倒政府，有时竟不晓得政府在那里，还疑惑他在大城镇里的大工厂里咧。这种经济独占的流弊，使文学、美术等等，都落在欧洲之后，现在虽随时想去改正，将来终难保不发生冲突。

第四，家庭。家庭的组合，有时也趋于至尊的地位。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因为家庭之于人类所包的方面极广，是政治的、经济的、宗教的、教育的组合。所以他的趋势，渐渐把政治等等都压倒了，去受他的支配。最初家庭是个生计的组合，如衣服、饮食、奴隶、牛马、妇女，都是他的财产。他也是个教育的组合。这个例很明，凡人没有不受家庭影响的。推而至于政治：家庭制度便是酋长制度所由蜕化。再推而至于宗教：家庭也是宗教的首领；在家庭里的人，一切崇拜、贡献，都由家庭率先引导。所以家庭最容易到至尊的地位，把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教育等组合，都压下去了。

家庭的组合在人类生活上，本是很重要的。亲爱、和睦，以及保护幼弱的慈悲观念，都是从家庭生出来的。便是宗教家的胞与观念，也是从家庭生出来的。可是也有他的流弊：其一，偏于保守。保守一部的权力，传与一部的人，以至思想等等，都变成死的、硬的。其二，不平等。既提出一部分来给与大权，他部分自然被压下去；一部分有了大权，他部分自然不能充分发展。

第五，地理的区域。这是最后的一个例。小一点是邻居观念，大一点是同乡观念，根据地理上的区域，做种种组合。与以上几个例略有不同：同党同教的人，可分在许多区域里；反之，一个区域里可以有許多不同党、不同教的人。好的方面，是把宗教、政治等等的不同，都联在一起；坏的方面，便是区域的观念太深，此疆彼界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国界、省界、县界等等，都从此来了。

以上所讲，是说的吾们现在所讲的哲学的要点，吾们要去补救修正现社会现政治，须先知道群与群的如何接触，如何冲突。从前社会、政治的动摇，都是不知不觉的，随他自然的变迁，经了几十百年，去收他的结果。我们既生在现世，不要学古人那糊里糊涂的行去，第一要研究社会上冲突的是什么东西，第二要观察那一种组合太趋前了。研究了这两层，然后知道这种畸重畸轻的地方，然后才能去讲修正补救。总要使各种组合同时平等发展，即让一步，也要使各种组合不但不互相冲突，并且互相为用。所以这一派的学说并不是要一种组合趋前，是要各种组合都趋前，你取我与，我取你与，既不是完全保守，也不是完全推翻，先看出那畸轻畸重的地方来，然后去补救修正。这种学说，或者可以代替上述两派太笼统的学说。

四

前几回所讲的两个要点：第一，一切社会、政治学说的起源，都在社会、政治纷扰不安的时候；第二，社会、政治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，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、兴趣，把别种人群的利益、兴趣都压下去；结果一种人群独占优胜，那被压下的不平起来，便与优胜的发生冲突。

这种讲法，与从前政治哲学史、社会哲学史普通的讲法不同。诸位研究过政治哲学史和社会哲学史的，应当知道这种学说与从前陈说不同的所在。大抵从前的陈说有三派：第一派是竭力提倡个人的自由、权利、尊严。这是个人主义。第二派是不承认个人的自由、权利、尊严，注重全体的权利、制度、法律和秩序。第三派是调和于两者之间，讲究调和的方法，怎样使个人与社会调剂，怎样使自由、权利等等与制度、法律、秩

序等等调剂。照这三派的学说，只是一方面是个人，一方面是社会。吾们现在所讲的却不然。吾们所讲是一部分的人群占了优胜，他一部分的人群去和他冲突。

今天要提出两个大问题：第一，倘使以上这些话是对的，何以三四百年来的许多社会和政治哲学家都错了？旧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史上所谓个人和社会的冲突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第二，吾们现在的新学说和向来的旧学说有什么区别？还是单是纸片上讨论上的不同呢？还是实际上有根本的不同呢？

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，便是向来传出来的旧学说所谓个人和社会冲突究竟有什么意义？简单说，实在不是一方面个人、一方面社会的冲突，是两个社会的冲突。大抵一种人群已占优胜，变了社会上公认的社会，那反对的一面也是种社会，不过前一种是已经公认，后一种是未经公认。从社会上看去，似乎后一种是把个人去反对社会。其实他们所以反对，也为的是社会的利益、兴趣等等。所以与其说个人与社会反对，毋宁说一方面太占优胜，过于自由。他一方面也并不是反对法律、制度等等，不过是想加入一点于现社会里，去管理他、修正他罢了。明了了这一点，对于以下所讲的便有头绪。

所谓冲突的两方面都是个人也都是社会。优胜的一方面也是个人也是社会，反对的一方面也是个人也是社会。但是前者已经社会的公认，后者还是将来的罢了。最显明的例，第一如宗教，本在精神一方面，当时却屡与政治的人群冲突。第二如政治，也时时和别的人群冲突。第三如思想自由，更为显明，像伽利莱（Galilei）、布鲁诺（Bruno）都为这种冲突被人非难，受许多苦痛。就这种例根本看去，不过一部的利益已经社会公认，还有一部方兴的利益当时未经承认，并且与现状冲突，大家以为有危险。这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，是这一个以

利益为中心的人群，与他一个以利益为中心的人群在那里冲突。

例如所谓宗教与科学的冲突：中世纪的教会，确是社会公认的，他们的话，便是社会法律；一切立法、司法、教育等等，都在他们手中；他们替社会保存礼教，维持安宁秩序；他们就是社会，社会就是他们，与他们冲突，便是与社会冲突。一部分的新人，要发表意见的人，从他们眼中看去，是乱党，是叛徒，是自私自利。其实他们自己把持了社会，名为替社会维秩序，实是替自己保利益，这倒是他们自私自利的铁证。

最好的例便是东方人所常见的家庭：东方人以家庭为中心，家庭制度的利益，便是社会的利益，和他冲突，便是大错。年长的男子父兄，居一种特殊的地位，把卑幼、妇女的利益、兴趣，都压下去。后来时代变迁了，子弟要说一两句话，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信仰、职业、朋友、配偶，父兄便觉得这是与家庭制度的利益冲突，这也是与社会的利益冲突。其实子弟所要求的，也代表一种社会的利益，不过还没有经社会公认。所以冲突的两方都是社会，不过一方已经公认、一方未经公认罢了。

总而言之，从前所谓社会与个人的冲突，是两种个人、两种社会的冲突；不过一是已经公认，一是未经公认；那未经公认的，社会上便不当他是社会。凡世界上革新家的革新运动，都要经过三个时期：

（一）默认时期。例如女权运动——女子解放运动。十九、二十世纪，可称是女权运动的时期。从前男子所独享的权利，现在女子也要求分享。可是从前的女子，都忍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。英国法律，夫妇只算一个人；那一个人是谁，便是丈夫。大家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，不足为奇。这便是默认时期。